



回望抗战历史,有一种载体尤为直观——诞生于战地现场的黑白影像。这些影像不仅记录了侵略者的暴行与山河的创伤,更铭记着一个民族在绝境中迸发的血性与锋芒。

方大曾、沙飞、雷烨、赵烈、张爱萍……这些在战火中按下快门的人,他们经历了什么?那些珍贵影像的背后,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?历史不会忘记,一如他们给后人定格的一个个时光印记。

——编者

他们用光影记录烽火

■江怀

抗战烽火已经离我们远去,但留存于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抗战记忆则日久弥新。

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日子里,我走进抗战老照片的“光影矩阵”,追寻照片拍摄者的足迹,以及那些不可忘却的记忆。

1937年7月7日,激烈的枪炮声滚过炙热的夜空,打破了卢沟桥畔的平静。这一天,日本侵略者悍然向桥东的宛平城发起进攻,中国军人奋起抗击。

卢沟桥畔的战火硝烟很快向四周蔓延,老百姓们开始惊慌失措地逃离自己的家园。人流中,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没有丝毫犹豫,从北京协和胡同的家里跑出来,只身骑上自行车,朝着枪炮声密集的宛平城逆行而去。

这个背着照相机的年轻人,名叫方大曾。

一个平民百姓,为何不顾生死,要赶赴最为激烈的卢沟桥前线?

方大曾的良师益友、著名记者范长江在《沉静了的绥远》中说:“青年人的脑海中,只有光明与胜利的追求,所谓危险和艰难,我们值不得多加考虑。惊人的事业,总成功于常人不敢为之中。”方大曾成为第一个赶到卢沟桥前线的中国战地记者。他冒着炮火,采访并拍摄了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军人。

简陋的暗房里,门窗挡住了光亮,但挡不住远处不时传来的枪炮声。采访归来的方大曾,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照片洗印中,以致忘记了自己25岁的生日。

数天不分昼夜的连续奋战,方大曾洗印了照片,也撰写了照片背后有关一线战事的文字……1937年8月1日,上海《世界知识》杂志发表了署名“小方”的《卢沟桥抗战记》和数幅纪实照片。很快,《良友》杂志、英国《伦敦新闻画报》等国内外媒体也陆续刊发了他发自卢沟桥前线的专题摄影报道,让世界人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记录卢沟桥战事的文字和图片,了解了日寇的侵略暴行。

一个战地记者的勇敢无畏,不是一天炼成的。早在1936年11月,正值绥远抗战爆发,方大曾就从北京赶往绥远前线,采访中国军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,捕捉拍摄绥远前线令人难忘的战斗情景。

方大曾在战地通讯《从大同到绥远》一文中写道:“时到如今,我们的民族再也不需要那温柔幽雅的陶醉,而该有魁伟豪迈的姿态了!江南的朋友们,你们都到这里来吧,不只是这里的风景好,而且是因为这里的疆土需要我们的保卫啊!”

1937年7月28日,方大曾在保定再一次与范长江不期而遇。经范长江举荐,他成为上海《大公报》的战地特派记者。

在华北抗日战场上,那个曾第一个抵达卢沟桥前线的摄影记者“小方”,又穿梭在战火最为猛烈的抗日前线,在报纸上给我们留下了《前线忆北平》《血战居庸关》《保定以南》《保定以北》《由保定向北》《从娘子关出雁门关》等一篇篇带着硝烟味的战地通讯以及相关的战地图片。

1937年9月30日,当国人读到记者“小方”发表在《大公报》上的战地通讯

《平汉线北段的变化》后,就再也没有在媒体上看到他从抗战前线发表的文字和图片。

一个鲜活的生命连同他那带着战地硝烟味的图片文字,在国人视线里一夜之间就消失了。

在这之后,范长江在回答无数关心和打听方大曾下落的人时说:“我相信他不会有问题,因为他的机智,足以应付非常事变,他的才能也应该为中国新闻事业,中国民族解放事业,多尽些力量。”

随着岁月的流逝,方大曾再也没有“显影”,但他留下的文字和图片,成为中华民族的永恒记忆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中国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曾评价说:“范长江与方大曾双峰并峙,二水分流,一个长于文字,一个长于摄影,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双峰,可以并存于世、并存于史、并存于书。”

方大曾在《卢沟桥抗战记》中曾这样写道:“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,令人眷恋,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,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。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!”

历史走过了80多年的岁月,如今站在卢沟桥畔,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派繁荣景象。细细品味方大曾留给我们800多张穿越战火硝烟的图片,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。

二

1937年8月的一天,一个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、笔名叫“沙飞”的学生,背着朋友捐赠的摄影器材,匆匆赶赴炮火连天的华北抗日前线。

沙飞曾因拍摄《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》等照片而一举成名。这是他新闻摄影的开始,也坚定了他将一生奉献给摄影事业的信念。他对鲁迅始终怀有崇敬之情,把拍摄鲁迅的照片底片装在一个金属盒子里,一直带在自己身上。

当卢沟桥畔响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枪声后,沙飞意识到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,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,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”。当时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的沙飞,听到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后,更是加快了赶往一线战场的脚步。

这年底,沙飞穿上了八路军军装,成为解放区第一个以新闻记者身份投身革命的摄影工作者。这个后来担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、摄影战士,用手中的照相机定格了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打击侵略者的瞬间、拍摄了百团大战激烈的战斗场面、抓拍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抢救八路军伤员的忘我画面、记录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生活以及青年踊跃参军的黑白影像……一幅幅照片,组成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雄伟画卷,向世界传递和诠释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不屈精神和坚定信念。

“谁都知道,在国家如此危难的今日,要挽救民族的沦亡,绝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事,因此‘唤醒民众’是当前救亡运动的急务。但是,直到现在,文盲依然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%以上。因此单用方块字去宣传国难是绝不易收到良好的效果的。摄影即具备如上述种种优良的特质,所以,它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。”洋溢着血性胆气的沙飞,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个提出“摄影武器论”的人。他在抗日最前线向全国的摄影人发出了呼唤:“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,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,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。”

沙飞来自自抗战一线的摄影实践和呼吁,激励着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摄影工作者相继奔赴解放区,来到了抗日战争第一线。不仅如此,沙飞还以带徒弟和开办摄影训练班的方式,为晋察冀和华北解放区培养了一大批摄影骨干。在很短的时间里,石少华、雷烨、赵烈、吴印咸、徐肖冰等摄影工作者,组成了抗日前线的摄影团队。他们留下了众多珍贵历史影像,也为新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。

1942年7月7日,全民族抗战爆发5周年之际,在河北平山县一个名叫碾盘沟的小山村,一本伴随着硝烟、散发着油墨香的《晋察冀画报》诞生了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发行的第一本画报,也是沙飞等摄影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多年努力的结果。

《晋察冀画报》创刊号封面是彩色套版的八路军挺进长城照片,封底是骑兵照片,正文用了150多幅真实记录根据地军民抗击日寇的照片,图片说明采用了中英文两种语言。虽然创刊号只印了1000册,但一经出版发行,在国内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,极大地振奋

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,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声援和支持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说,《晋察冀画报》“既朴素,又美观,办得很出色。在山沟沟里能够出版这样的画报,曾使许多外国朋友深感惊讶”。

三

一幅幅真实记录根据地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图片,在抗日根据地乃至更广泛的地域传播时,成为“比炮弹更有力量的精神食粮”。

浇灌这些“精神食粮”的不仅是摄影人的汗水和智慧,还有鲜红的热血和鲜活的生命。

1943年春天,乍暖还寒。在河北平山县曹家庄一个普通简陋的农舍里,时任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、组织科科长的雷烨,紧张地进行着图片选定和图片说明撰写。

此前,雷烨见到了时任晋察冀画报社主任沙飞,便给沙飞看了近4年来他在冀东抗日根据地拍摄的战地图片。

在对敌斗争异常残酷的冀东,雷烨随八路军转战长城内外、滦河两岸,用照相机记录了日寇烧杀掳掠、无恶不作累累罪行。雷烨拍摄的照片中,就包括了日寇在1941年对河北丰润潘家峪制造大惨案的真实记录,留下了历史的铁证。沙飞看到这些战地照片后,当即决定在《晋察冀画报》出版专辑,并将雷烨留下来,在画报社整理照片、撰写战地通讯。

4月19日夜晩,数百名日军在“扫荡”时袭击晋察冀画报社驻地——曹家庄。接到转移通知的雷烨立即放下手中工作,并未跟随大部离开,而是指挥村民转移。次日拂晓,村庄被日军包围。雷烨因疏散群众延误了最佳撤退时机,又因对当地地形不熟,在转移时与日寇遭遇。短兵相接中,雷烨身负重伤。生死关头,他果断选择掩护警卫员突围。见警卫员执意不肯,雷烨斩钉截铁地说:“要死死我一个,你们快撤。这是命令!”

两名警卫员成功突围后,孤身一人的雷烨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。这名视死如归的摄影战士,为了不当俘虏,在砸毁心爱的相机和自来水笔后,将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,壮烈殉国。

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,日军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“扫荡”和“围剿”,而晋察冀画报社始终是敌人要剿灭的重点目标。画报社在一次次与敌人的斗争中转移,人员从120多人减员至六七十人。

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摄影战士来说,1943年是极为悲伤的一年。雷烨等摄影战士在年初牺牲后,晋察冀画报社在年底又遭到了重创。

1943年12月,晋察冀画报社所在地——河北省阜平县柏崖村遭遇日军“扫荡”。危急关头,沙飞和警卫员赵银德背着装有底片的牛皮包向外突围;时任晋察冀画报社政治指导员赵烈率领部分人员担任掩护。

当大部分人员突围成功时,赵烈回过头来一看,发现有几个人还在村里未能冲出来。于是,赵烈奋不顾身地返回村里援救战友。

赵烈因寡不敌众,不幸中弹牺牲。一名年仅23岁的摄影战士,就这样英勇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在这次突围中,晋察冀画报社全体人员践行了“人在底片在”的誓言,几万张底片无一损毁,而赵烈等9位同志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柏崖村。

日军撤走后,大家从赵烈身上发现了那本雷烨留下的相册。小小的相册,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染上了两位摄影战士的鲜血。

雷烨、赵烈等一大批摄影战士,在战火纷飞的抗战一线,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如何将摄影装备从艺术或新闻工具,转化为政治动员与民族救亡的武器。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抗战史定格了真实、生动、有力的视觉证言。这是血雨腥风中不屈的“视觉火炬”,伴随着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漫漫征程。

四

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,诞生了这样一幅图片:在东方欲晓的天空背景下,一名新四军战士骑在骏马之上,吹着手中的军号。

这幅取名《破晓》的照片,后来不仅在多家杂志上刊登,还出现在小学语文课本上。

拍摄这张照片的,是时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张爱萍。

20世纪20年代中期,尚在四川达县上中学的张爱萍,第一次来到照相馆,就被橱窗里的照片吸引住了,由此埋下了摄影爱好的种子。自那以后,受经济条件制约,无法拥有一架照相机的青涩少年,凡是遇到与摄影相关的书籍便找来认真阅读。

在空军的戎马生涯中,怀揣摄影梦想的张爱萍,终于等来实现梦想的机会。在苏北抗日战场上,新四军战士在一次战斗中,缴获了一架德国造的徕卡相机。从此以后,官兵看到了这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身上,除了手枪之外,又多了一件“武器”——徕卡相机。

在南征北战、兵戎相见的抗战前线,张爱萍用相机记录了《八路军南下部队挺进苏北平原》《收复青阳》等许多珍贵的战斗瞬间,也定格了众多抗日军民的战斗、练兵、生产、工作、学习与生活等场景,留下了千余幅既有艺术价值又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照片。

1981年12月的一天,国防科委摄影美术汇报展览在北京举行。张爱萍在参观结束后欣然命笔:“妙笔,纤刀,闪光灯,三千毛瑟莫当!”

这是张爱萍对摄影实践的深切体会,也是对那些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影像作品给予的高度评价。

历史不会忘记,当抗战的烽火熊熊燃烧时,有一群无私无畏的勇士,带着妙笔般神奇的摄影器材,携着纤刀般锐利的镜头,义无反顾地冲向抗日第一线。那一张张照片,如同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刃,亦如鼓舞全国人民奋起的战鼓。

三千毛瑟莫当!这些摄影作品以直观而震撼的方式,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,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,成为抗战史上永不磨灭的铁血印记。

版式设计:王凤

长征

第6533期

